

张仲礼 主编

中国近代城市 企业·社会·空间

ZHONG GUO
JIN DAI CHENG SHI
QI YE · SHE HUI
· KONG JIA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近代城市 企业·社会·空间

张仲礼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惠丽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

张仲礼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2 字数 443 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80618-368-X/F·384

定价:25.00 元

序 言

张仲礼

中国城市史研究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重视的课题,从国内到国际,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会,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自1988年以来,就举行过3次。收在本书的论文,便是我们在1996年8月举行的第三次中国城市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的汇编。

自近代以来,世界就被联成一个整体,从蒸汽机时代,到电子时代,各地、各国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城市,就是这一联系中的一个网结。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心,信息交汇中心,也是一国一地发展水平、文明程度的标志。因此,自近代以来,城市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门学科都不能忽略的大题目。上海是中国的特大城市,研究城市史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自建院以来,就一直将城市史的研究列为重要课题。我院最老的两个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或将城市经济史、企业史,或将城市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列为研究重点,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专门人才,终于在各自的领域里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1996年,是这两个所建所40周年。我们藉他们纪念建所40周年的机会,邀请世界各国和港、澳、台的学者,召开关于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既是交流,也是回顾和总结。这两个所的学者,在这些年里,联合承担多项重大课题,他们合理分工,通力协作,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开创了所际合作的很好范例,也开创了对外学术交流的良好范例。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大多数与上海有关,或者说大多数是关于上海史的论文。这固然由论文作者的学术兴趣所致,但更根本的原因,我以为与上海史的研究价值有关。50 年以前就有学者指出,在世界范围里,美国、欧洲是城里,中国是乡下;在中国范围里,上海是城里,其他一般城市(包括一些省城)是乡下;在一省范围里,省城是城里,集镇是乡下。在中国联系的这个环节上,上海既是城里又是乡下的特殊角色,使得上海历史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来说,内蕴极为丰富,可待开发的部分极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近代上海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城市管理最讲究科学、最为缜密的城市,也是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留下可资查阅、统计、分析的资料,远远多于其他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能够满足当代史学研究定量的要求。这也许是有些人对上海城市并无兴趣,但又选择上海作为研究的原因。

本书论文的作者,除了我院的研究人员以外,大多数是国外和海外学者,其中,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是新朋友,对于他们应邀与会、提供论文、参加讨论,我谨藉此机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 年 12 月

目 录

序言	张仲礼 (1)
城市政治与管理	
战时上海的城市管制	魏斐德 (1)
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	周 武 (19)
租界与近代上海城市建设	陆兴龙 (36)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	黎志刚 (48)
上海的战后审判 ——萨尔礼事件与法租界的归还	白吉尔 (54)
企业制度·经济变迁·商业文化	
从新亚制药厂看上海在抗战期间的经济地位	高家龙 (72)
近代上海洞庭帮	马学强 (83)
社会环境与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形成	沈祖炜 (103)
近代通货膨胀下的企业运作	杜恂诚 (118)
论开埠后上海民族经济的三次变迁	樊卫国 (129)
从资金流动看中国银行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李一翔 (147)
试论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逻辑演进	张忠民 (159)
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 进步中的作用	黄汉民 (174)

论上海近代企业的技术进步·····	钟祥财	(188)
近代上海道契产生及其职能消亡的历史过程 ·····	陈正书	(201)

社会组织·传播媒介·公共空间

中国近代都市的“公的领域” ——关于民国时期上海的救火会·····	小浜正子	(223)
读者之声:上海和香港最早报纸里的读者来信 ·····	费南山	(260)
从上海报纸看上海人形象和声音·····	梅嘉乐	(266)
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	杨 誉	(272)
《良友画报》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	许 敏	(296)
上海:“世界游戏场” ——晚清妓女生意经·····	叶凯蒂	(308)
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 ·····	熊月之	(336)
路、里、楼 ——近代上海商业空间的拓展·····	罗苏文	(360)

移民·城乡关系·文化·近代化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卢汉超	(392)
香港网络与亚洲地区的关系·····	滨下武志	(411)
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 ——上海广肇公所初探·····	宋钻友	(415)
明治时代的上海日本居留民·····	陈祖恩	(432)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社会·····	高纲博文	(446)
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 ——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	梁元生	(466)
民智的开启与近代化 ——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的西洋认识·····	蔡建国	(485)

函夏考文苑：民初的学术理想	李天纲	(500)
上海月份牌画——美术与商业的成功合作	陈超南	(522)
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叶 斌 马 军 甘慧杰 陆文雪		(535)

城市政治与管理

战时上海的城市管制

魏斐德

在国民党统治早期，为实现城市管理现代化，对外国租界重新获取主权，上海公安局就成了检验新政权能否进行有效统治的试验品^①。但是，尽管国民党成功地镇压了上海共产党的运动，当他们于1937年被日本人赶出上海时，在上述两方面的工作都失败了^②。汪伪政府表面上取得了对整个城市的民族主权，但其代价是在日本人的实际统治下，贪污腐败，猖獗蔓延，官匪勾结，卑劣不堪^③。然而颇为矛盾的是，在日本军队于1941年8月占据公共租界以后，汪伪政府加强了中国警察对城市人口的控制，而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寻找新的机会，扩大它在上海的地下活动^④。本文将向大家阐述在1937~1945年期间，历届伪政权和日本势力统治时期，新的城市管制机制是如何在上海产生发展的。可以说，这些机制在1945年国民党全面统治上海，以及1949年国民党逃离以后，共产党统治上海时，都得到了继承。

一、繁荣和萧条

上海是世界上第一批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大城市之

一。在上海战争期间(1937年8月~11月),900家面粉厂、作坊和工厂被毁灭,破坏了上海70%的工业能力,使60万人失业^⑤。难民大批涌入10平方英里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使租界内的人口一下子从150万增加到了400万,平均每户人口达31人之多。许多人就住在由市政府机构和慈善机构临时搭建的难民营里,但是仍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挤在街头,睡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寺庙里或同业公会的大厅里。到了冬天更出现了饿死和露天冻死的情况。年底,从大街上和废墟中找到了10万多具尸体^⑥。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孤岛的上海竟然开始享受经济繁荣^⑦。公共租界里的纺织厂被冠以英国或美国名字后,又开始恢复生产,另外还新建了7座新的工厂^⑧。400家小型企业在公共租界里迅速崛起,生产工业化学品、药品、灯泡、热水瓶、电扇以及香烟。美国人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花了200万美元购买新设备。航运和保险也有增长^⑨。

出现经济繁荣需求增加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移民人口(包括逃离法西斯的欧洲难民)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个原因是,后方自由中国通过日本战线进行的每年1.2亿美元的贸易^⑩。出口贸易也有增加,因为50家德国公司从上海采购大量的粮食、衣服、鞋子,运往第三帝国供给战时的百姓^⑪。

但是社会混乱现象却日趋严重:“贫民窟逐渐象癣一样布满城市的表面。政治恐怖事件几乎每天发生。”^⑫换句话说,1938年导致上海这次深度社会阶级分化的最初繁荣,同时也导致了普遍的城市混乱,要求有更强有力的措施进行管制。当最初的繁荣开始走下坡路时,城市经济的一阵风刮过之后,更是如此^⑬。

1939年当日本人开始停止长江上的商业交通,把上海与后方切断以后,1937~1938年间难民驱动的经济繁荣就开始衰退。商品价格直线上升,大批工人罢工。铜币和镍币都被没收,邮票被当作货币使用。1940年新年过后,上海股票市场失控。投机者对

“战争婴儿”股票的报价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交易所因“每一个谣传而上下波动。”^⑭

到了1940年5月，上海的投机者开始以每包1000美元的价格贮藏大量的棉花，计划通过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运往欧洲。到了6月，他们已把价格抬高到了2000美元一包。6月25日，法国与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日本遂敦促新维希政权在印度支那关闭海防港口，禁止中国船只进入。表面繁荣的棉花市场一下子崩溃了。由于无法付出亏额，50多家进出口公司破产，使股票交易更加萧条^⑮。

如果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00，那么1941年3月，食品的价格为774；房租385；服装503；燃料636；其他杂货599。南市日渐萧条，中央市场也荒弃了。虽然贫富差距继续加大，但由于日益高涨的战争通胀的重压，他们不论贫富都在珍珠港前夕垮掉了。对中国工人来说，仅从1937年抗战以来，物价就上涨了10倍，而对外国人来说，生活成本以每个月近9%的速度增长^⑯。当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时，街头犯罪也增加了，对更严格的警察管制的要求也相应增加了^⑰。

二、伪政权警察的扩大

只要外国租界继续存在，警察管理和统治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四个不同的权力机构：主管着占领区的日本军队和领馆的警察、受前者管辖的中国伪政权警察、主要由英国人组成的公共租界巡捕、以及法租界巡捕。这些势力相互竞争，争夺对上海有争议地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察为控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的越界筑路，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让，竞争尤为激烈。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察就一直为这些道路和道路两旁建造的房产相互斗争了15年。当1938~1939年沪西地区有争议的“歹土”上犯罪越来越猖獗时，两者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紧

张^⑩。

1939年1月22日,上海伪警察局西区分局在沪西各警察局张贴通告。通告由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92号沪西分局局长王德林(译音)签发,命令人们立即停止与工部局巡捕打交道,以后将所有案例向沪西分局报告^⑪。

在那时,伪政权警察并没有力量在沪西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是上海伪警察局长卢英却在逐步地扩展其在沪西地区的势力。从1939年1~2月初,警察人数从64名增加到了230名。而且伪政权警察还得到了极司非而路92号日本军警分部的支持^⑫。随着伪政权警察在沪西的势力日益壮大,它对工部局巡捕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凡涉及到西区租界外管辖地区的事情,其对租界当局的态度越来越强硬。”^⑬

1939年4月,伪政府的常规警察人数已增加到5155名,比2月份时增加了将近60%^⑭。当时的日本特工分队也建立了一个武装警察部,由400名投降的中国游击队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起组成,一次性付给他们10元的报酬,并许诺以后每月付给他们20元。武警总部设在西区的黄家花园,由吴佩孚的一名前陆军准将指挥。日本特工分队的顾问是一名叫西村的陆军上校,情报部门的头是顾竹华(译音)和一个青帮贩毒头子胡安邦(译音)^⑮。日本人计划最终招收1.5万名准军警进入武装警察局^⑯。1939年5月,一名前地方行政官、工部局的副督察长被任命为武装警察部总指挥;武装警察部被授权管辖浦东地区涉及抗日分子的刑事案件^⑰。

这些匆匆召集的流氓无赖之辈,穿着便衣时,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会被人误以为是带着武器的强盗^⑱。实际上,对于工部局的英国督察们来说,这些新的伪警与土匪没什么两样。从上报的报告来看,从武力犯罪活动中缴获的手枪或子弹,90%是刚从在沪西值班的工部局巡捕那儿偷来的^⑲。对于公然的犯罪,武警总视若无

睹。如1939年1月4日,带着武器的流氓就在哥伦比亚路和大西路支局门口抢劫了12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伪警局根本不加干涉^⑧。

三、地域争端

公共租界巡捕与伪政权警察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警察在上海市区外的扩张性增长而变得更加紧张^⑨。这种扩张在日本常规军打败和监禁了在郊区一带活动的中国抗日游击队后,就开始出现了。例如,1939年3月以前,浦东奉贤地区完全在游击队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岛将军指挥军队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扫荡之后,该地区的抗日活动被完全肃清^⑩。当时的伪市长傅宗耀[即傅筱庵]命令伪警察局长卢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分局,由特工分队特务山下任顾问^⑪。

到1939年6月,上海伪警局已拥有11个分局,5个警察支局,和8个其它的警察机构(侦察队、卫戍区、警备区、河警支队、警察训练站、警车、拘留所和警察医院),共有5,662名男女成员,比4月份增加了507人^⑫。

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伪警局不断扩大其在郊区的势力,同时与沪西工部局巡捕房的对抗也日益激烈^⑬。1939年8月19日,租界巡捕捕头在极司非而路开枪射死了一名伪警副侦探兼中士。结果傅市长的政府告诫西区警察“要对租界巡捕采取强硬大胆的态度”,并授权其警察对任何胆敢干涉他们在沪西执行公务的人,不管是何国籍,均可采取武力^⑭。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后,日本人马上支持上述中国警察对越界筑路实施主权的新决定^⑮。日本宪兵占据了极司非而路两旁的几个大住宅区,并在它们的大门外用沙袋筑起了机关枪射击工事^⑯。他们还把海格路448号原来一家赌场改成了日本武警的宿舍。9月14日,极司非而路92号入口处贴出了一张由沪西警察分局长王德林签发的通

告，宣布西区现由“维新政府”管辖，并邀请工部局巡捕房的成员加入市伪警察局，他们将给予同样的薪水^⑧。

租界当局一开始拒绝承认伪政府的宣告，并于中国和锡克人巡捕在越界筑路上执行交通公务时遭射击后，立即予以报复^⑨。10月22日凌晨，工部局警官和极司非而路76号的伪特务展开了一次长达30分钟的枪战^⑩。

那时，日本领事和军方当局正在激烈地争论，认为抗日恐怖活动和公共租界连续不断的犯罪风波证明，工部局警方根本没有能力维护法律和秩序，所以有必要让中国人自己管辖沪西，甚至收回外国租界^⑪。伪政府的媒体也附和这样的言论，说外国租界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安全的作案场所，而上海市伪警局则已成功地镇压了其辖区内的违法犯罪活动。

四、暂时妥协

汉奸要得到在沪西地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权利，是因为当时正值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谈判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党政府。这些谈判要点之一是支持汪的爱国使命，恢复中国对租界行使主权。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把治外法权和犯罪活动联系了起来^⑫。“租界成了中国犯罪活动最大的避风港，为了肃清市里的不法分子，所有外国租界的退还应立即受到重视。只要外国租界不退还，上海将永远没有和平或安全。”^⑬

英国政府敏锐地感到，汪精卫汉奸政权一旦成立，那么在对外国租界的处置上，它将比现在的“大道政府”具有大得多的影响。现在的“大道政府”只是一群文化上保守，政治上反动，令人作呕的傀儡，对日本特工分队的每一个指令都卑躬屈膝地服从。因此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越来越倾向于与软弱无能的市长傅宗耀谈判，订立一个有关沪西地区警察管辖的协议^⑭。

1940年新年一过，傅市长的代表和上海工部局秘书兼督察

长哥德傅瑞·菲利蒲之间的讨论就开始了。虽然日本人和极司非而路 76 号的伪政府特务试图谋杀菲利蒲，以推迟协议的达成，但是暗杀活动失败了，双方达成了一项原则上的协议，即成立一个西区特别警察局，其主要警官将由上海工部局推荐的候选人担任^④。

对沪西实行和平的警察管理的诺言由于极司非而路 76 号特工分队的活动而落空了。这个恐怖天堂由李士群和丁默邨操纵，他们两个是共产党的叛徒。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情报组织，结果又背叛了他们新的特务头子，转而向日本人提供情报^⑤。

李士群原是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上海地区的头。1938 年，他与国民党的另外几个情报头子一起向日本人告密。他作为上海青帮的一员，利用自己作为国民党官员操纵的间谍和特务，为日本人作走狗。他很快又取得了另一位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加盟。吴招收了当地的流氓充当汪精卫和其他重要汉奸的护卫^⑥。

丁默邨 1933 年作为“CC 派”“社会新闻”编辑时曾指导过李士群的工作。他曾是中统(国民党秘密特务组织)第三小组的负责人。1938 年 8 月该部门改组，交由军统(军队特务组织)头子戴笠主管^⑦。表面上他已退出情报工作，但这个“丁小鬼”(他只有 5 英尺 1 英寸高)未经蒋介石同意便去了香港，并于 1939 年受雇于李士群，回到上海为日本人卖命^⑧。1939 年 7 月，李、丁活动搬到了极司非而路 76 号，开始一面鼓励国民党特务的叛变活动，一面又搞垮这些特务背后的组织机构^⑨。

根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76”号也对多起无耻残忍的暗杀活动负责，且这些暗杀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更是成倍增加^⑩。到了 1940 年 4 月，上海工部局秘书菲利蒲觉得有必要写信给意大利总领事、上海外交使团团长 L·涅龙指挥官。在信中，他对“76”号“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的活动表达了极大的忧虑。他说这个组织“对上海的和平和秩序构成了一种严重到骇人听闻的威胁。”^⑪菲

利浦相信除非该组织得到抑制，否则新设立的西区警察局能否在沪西执行法律和秩序都令人怀疑^⑤。

五、暗中企图杀害外国警察

由于法国的沦陷，法租界的限制也不复存在。1940年6月，新的维希政权把徐家汇的警察管辖转给了伪政府，伪政府同时也获准在法租界活动，对抗亲重庆的恐怖分子^⑥。这种对汪伪当地政权新的安排只是1940年夏末秋初，为贿赂公共租界上的警务处所采取的措施之一^⑦。

1940年9月16日，有两人试图暗杀警务处特别分队的队长、副专员R·W·约克，但未成功。这次暗杀企图就发生在警务处暂令360名涉嫌听从唆使的巡捕停职的当天。由于约克负责调查此次颠覆活动，且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同行布朗特中尉，三周前也差点被极司非而路76号的暗杀分子杀掉，因此两者间的联系十分明显^⑧。

六、沪西特别警察总署

1940年的秋冬，由于潘志杰(译音)的任命和汉奸市长陈公博采取的强硬路线，使前市长傅宗耀和当时上海工部局总董康耐尔·S·弗兰克林于1940年2月原则上签订的警察协议难以实施^⑨。但是警务处肯尼·波恩少校和上海市伪警局的陆鹰上校继续谈判，并在新年犯罪高潮的驱动下，于1941年1月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在沪西这块“歹土”上建立一个沪西特别警察总署，警官由租界、伪政府和日本的督察员共同组成^⑩。当他们把临时协议提交给上海工部局和南京的中国政权时，协议获得了批准^⑪。

2月1日，陈公博市长和上海工部局总董W·J·凯斯威克在江湾的中国市政厅会面，一起签署警察协议^⑫。协议宣布了沪西特

别警察总署(简作 WSP)的成立,控制以前由沪西警察分局管辖的地区,即徐家汇警察分局管辖的一部分,以及由上海外国防卫军现在守卫着的地区^⑤。

新的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将由现有的警察队、整个沪西分局、徐家汇分局的一部分、侦察分队以及上海工部局推荐的警官组成。根据规定,这将在上述地区执行警务的唯一机构,并在上海市伪警局的指导下进行活动^⑥。人数最高限额是 1466 人,另有 12 人的后备队,分作 5 个警察局,几个分局和支局^⑦。

居民大多为外国人地区的警局负责人将由伪市政府根据上海工部局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包括中国人)指定。每个警局基本上都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警察组成,但指挥官以日本人和欧洲人占多数。如果对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有争议,那么将由上海市伪警局和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别专员来解决;如果仍然无法解决,那么将由市长和上海工部局总董作出最后决定。

根据协议,市政府和公共租界的警察将通过联络官,就情报事务、搜查和引渡案件相互合作。在紧急追踪罪犯或恐怖分子时,所有三股警察均可跨越地域界限。

协议的一个特别附件规定“在其管辖的地区内不得从事任何非法活动(例如经营赌场、从事鸦片和毒品的交易、以及向吸毒者提供此类毒品)。”^⑧在一开始的谈判中,汉奸警方当局并不愿意按附件所说的合作,就是因为汪精卫政府是一个“蒙特卡洛式政权”,其财政很大一部分来自毒品的销售、给卖淫活动提供执照、以及从赌场收取费用和佣金^⑨。不用说,在 1941 年 3 月 17 日,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在大西路 57A 正式开门,潘志杰署长令其警察穿上新的警服执勤之后,赌博和毒品交易仍然盛行不止^⑩。

七、陈公博镇压犯罪活动

由于汪精卫政权内部周佛海和李士群之间的明争暗斗,后者